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伦理

李正栓¹ 叶红婷²

(1.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荆楚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北 荆门 448000)

摘要: 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伦理悲剧。李尔一家四人错误的伦理选择导致了国破、家毁和人亡。这是李尔王室家族成员伦理失范导致的结果。李尔无论作为父亲身份还是国王身份都未能正确行使, 其错误的伦理选择是该剧悲剧结果的主要原因。长女和次女在畸形爱情中的伦理选择既违背女儿身份的天良, 也破坏了夫妻纲常, 更破坏了国家治理的政治规矩。三女儿值得同情, 也值得憎恨, 其女人身份使其选择爱丈夫也爱父亲, 其女儿身份又让她替父报仇, 然而她忽略了国家伦理身份, 带领法国军队到英国作战, 犯下了入侵的错误。莎士比亚这部悲剧令人深思, 对后世产生不绝的启迪。

关键词: 《李尔王》; 伦理身份; 伦理选择; 伦理禁忌

中图分类号: I561.0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3)06-0045-09

0 引言

1604年5月正是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 他此时开始创作悲剧《李尔王》(*King Lear*)。此时, 他对社会人间百态了解至深, 逐渐形成了他对世界的看法, 对何为国家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与其早期历史剧创作中对国家和国王的认知形成一脉(华泉坤等, 2007:307)。布拉德雷(Andrew Cecil Bradley, 1851—1935)认为《李尔王》是莎翁“戏剧中最好的一部”, “如果人们不得不失去莎士比亚所有的作品, 只保留一部, 也许大部分了解和欣赏莎士比亚的人会选择保留《李尔王》”(Bradley, 1992:119)。从伦理角度而言的确如此。它对人性刻画如此深刻, 当属其戏剧成就之巅峰。

古不列颠国王李尔年迈体衰之时, 准备退位休息, 计划根据三个女儿对他的爱意表达三分天下。长女高纳里尔(Goneril)和次女里根(Regan)花言巧语, 博得父亲欢心, 取得国土统治权。三女儿考狄利娅(Cordelia)实话实说, 不刻意恭维并哄骗父亲, 惹怒李尔, 被剥夺国土管理权并被远嫁法国。李尔退位后, 高纳里尔和里根联手逼迫父亲流落荒原。成为法兰西王后的考狄利娅率法军救父, 被英军打败, 被缢死狱中。一起被俘的李尔抱着考狄利娅在悲伤中气绝身亡。剧中还有一条主线: 大臣葛罗斯特(Gloucester)的庶子埃德蒙(Edmund)构陷哥哥埃德加(Edgar)、出卖父亲, 继承爵

收稿日期: 2023-07-15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英语专业一流课程群建设研究与实践”(2021YYJG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正栓, 男,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英汉诗歌互译及评论、典籍英译研究。

叶红婷, 女,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荆楚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

引用格式: 李正栓, 叶红婷.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伦理[J]. 外国语文, 2023(6): 45-53.

位,为得到更多权势,同时对高纳里尔和里根大献殷勤。陷入情欲漩涡的高纳里尔毒死妹妹里根,并意图谋杀丈夫奥本尼(Albany),阴谋败露后自杀。《李尔王》就是告诉观众和读者,伦理失范的结果就是:国破、家毁、人亡。

关于《李尔王》的悲剧成因,学界众说纷纭,集中表现为性格悲剧、社会悲剧。也有评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还有人结合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分析,认为“李尔王不具备《君主论》中关于一个好君主的品质,必将迎来悲惨的结局。(葛靖,2022:77-79)”对于剧中人物,评论界总体呈现出贴标签式的一元论批评,如大女儿和二女儿几乎被认定为十恶不赦的“不孝女”;小女儿是诚实、善良、孝顺的“天使”化身,等等。但是,剧中人物都有性格缺陷,每个人的性格缺陷又可以为其他人的行为做出解释。其实,莎士比亚并不想仅仅简单地创造几个扁形人物。这些人物的行为和命运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更多的思考。他的这种客观呈现手法影响了不少后世作家。《李尔王》本身兼具叙事性和伦理的双重特性,文本蕴含着政治权谋、家庭伦理、君臣关系、政治秩序、爱恨情仇、人性善恶、权色欲望等诸多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吴笛认为:“发现文学经典的伦理价值,并且从文学经典中获取伦理教诲,培养经典研读和文学批评视野中的伦理意识,是知性人类经过进化之后而在经历伦理选择过程中必然的理性需求和价值取向。”(吴笛,2022:27)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入手,探究李尔一家四人的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和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

1 李尔:父亲伦理身份被破坏,国王伦理身份被解构

聂珍钊指出,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是人的根本标志,身份决定行为,身份承担责任,身份要尽义务(聂珍钊,2014:263)。李尔即是父又是王,具有双重伦理身份。李尔的悲剧与他伦理身份错乱和错误的伦理选择息息相关。这不仅是李尔的悲剧,也警醒世人。

1.1 三分国土,一场爱的考验?

李尔打算退位,对王权继承问题如是安排:“我已经把我的国土划成三部;我因为自己年纪老了,决心摆脱一切事务的牵萦,把责任交卸给年轻力壮之人,让自己松一松肩,好安安心心地等死。康华尔贤婿,还有同样是我心爱的奥本尼贤婿,为了预防他日的争执,我想还是趁现在把我的几个女儿的嫁奁当众分配清楚。”(莎士比亚,2019:3)

这里“三分天下”的打算看似会导致国家分裂,也受到一些评论家的诟病。波兰批评家简·科特(Jan Kott)曾在《莎士比亚——我们的同代人》(*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中明确总结了许多评论家的观点:“李尔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懂……他荒谬、幼稚且愚蠢至极。”(Jan Kott, 1966: 130)但考虑到莎士比亚1604年创作《李尔王》的伦理环境,首先这个剧情安排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创作目的。当时,国王詹姆士一世为了巩固王权地位曾大肆封爵赏赐,结果却激化了社会矛盾。李尔分国及其引发的后续矛盾无一不折射着作者当时所处的政治现实。其次,也有人认为,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没有儿子的李尔放弃传统的长子继承制,将三个女儿视为合法继承人,并将国土三分天下,相互制衡,以实现王族权力的世袭罔替,不失为一个智慧而非凡的政治举措,也符合一个国王的政治伦理道德。

或许李尔想构建家庭亲情、君王权威和国家安稳“三位一体”的美好伦理环境,或许三分国土也无过错。但他制定了错误的三分国土的标准:“在我还没有把我的政权、领土和国事的重任全部放弃以前,告诉我,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最爱我?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

惠。”(莎士比亚,2019:3)这一伦理选择看似将王权与家庭礼法融为一体,实则证明李尔将父亲与国王的伦理身份混为一谈。

首先,身为国王,李尔更应考量王位继承者的德性与才能,但最终他评判的依据是口头爱的表达。这无异于引导女儿们依靠表面圆滑和故作顺从获取权益,而忽视对王权继承者的德行教育与考察。李伟民认为:“李尔表现了对于王权的迷信,他要借助王权获得父爱,享用父爱,哪怕这种‘爱’是表面的,即利用王权巩固在三个女儿身上的父权地位。”(2008:102)于是,大女儿和二女儿用漂亮话使李尔王龙心大悦,获得分封。而考狄利娅没有说出漂亮话,惹得李尔怒不可遏,与她断绝关系,将她远嫁法国:“我发誓从现在起,永远和你断绝一切父女之情和血缘亲属的关系,把你当作一个路人看待。”(莎士比亚,2019:6)这场伦理冲突非常符合李尔王长期唯我独尊的国王伦理身份。在封建统治者的伦理意识中,女儿应绝对顺从父亲,而考狄利娅的坦率就成了他眼中的“硬刚”,是对他双重伦理身份和双重权威地位发动的双重挑战,是有违伦常的忤逆之举。

其次,身为父亲,李尔虽贵为王族,但他的家庭教育是粗陋与失败的。每当与女儿们产生伦理冲突时,他不是循循善诱进行教育引导,而是用粗暴的方式怒骂或惩罚。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一书中指出:“父爱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性质,即服从成为主要的优点,不服从则是主要的缺点……对不服从的惩罚就是收回父爱。”(弗洛姆,1988:264)李尔偏爱考狄利娅,但认为她不服从之后,就翻脸无情地断绝父女关系,以示惩戒,维护他作父亲的权威。对另外两个女儿的诅咒和谩骂则更是极尽能事,完全不像一个父亲说出的话,比如让女儿失去生殖能力、凡与生殖有关的器官都干涸,话语很恶毒,比非血缘仇人还狠心(莎士比亚,2019:34)!“但愿恶风吹打她的腹中的胎儿,让它生下来就是个跛子。”(莎士比亚,2019:59)“你是我的腐败的血液里的一个瘀块、一个肿毒的疮疮。”(莎士比亚,2019:62)恶语伤人导致两个女儿后来藐视孝道与家庭礼法。另外,身为父母理应遵循对子女平等相待的家庭伦理。李伟民指出:“在西方的伦理价值观中以自由和平等为前提,如果父母的行为是不值得尊重的,那他们将失去子女对他们的尊重甚或与之脱离关系。”(李伟民,2008:23)李尔毫不掩饰地当众表示打算将国土最好的一部分留给小女儿。另外两个女儿势必早已感知李尔王的偏心。高纳里尔曾说:“他一向都是最爱我们妹妹的,现在他凭着一时的气恼就把她撵走,这就可以见得他是多么糊涂。”(莎士比亚,2019:13)里根则表示:“谁知道他心里一不高兴起来,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们?”(莎士比亚,2019:13)她们会带着提防甚至报复的心理,努力纠正这种伦理偏失,提高自己不平等的家庭地位,后续姐妹联手遗弃退位的李尔王,似乎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伦理选择。

总之,从本质上说,李尔的分国并不是一位父亲用慈爱的奉献与付出赢得女儿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敬重,而是企图用王权操纵女儿对他的亲情孝心和赡养义务,亲情最终将被权力和欲望腐蚀、消解并畸变。

1.2 百名骑士,退位国王的尊严? 还是对新任君主的威胁?

李尔与考狄利娅之间的伦理冲突推进了戏剧进一步发展,他把原本拟分给考狄利娅的国土给了甜言蜜语的长女和次女:“我把我的威力、特权和一切君主的尊荣一起给了你们。我自己只保留一百名骑士,在你们两人的地方按月轮流居住,由你们负责供养。”(莎士比亚,2019:7)

百名骑士是他维系王权尊严的形式,交出国王实权后,他仍在意王者的尊位虚荣与外在威风。最终,百名骑士,是留还是不留,成了伦理上的悖论。“伦理悖论指的是在同一条件下相同选择出现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伦理悖论往往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没有选择即没有悖论”(聂珍

钊,2014:254)。李尔笃定两个女儿得到分封后会对他感恩戴德,但他没有想到退位反倒让自己陷入了困境。高纳里尔表露了自己的心迹“这老废物已经放弃了他的权力,还想管这个管那个……年老的傻正像孩子一样,一味的姑息会纵容坏了他的脾气,不对他凶一点是不行的……”(莎士比亚,2019:22)正如姜林指出:“李尔王错误转交继承权之后而陷入的身份困境、个人困境和国家困境,其要是灵魂困境,个体的与国家的灵魂之困,而非身体之困。”(姜林,2021:123-135)李尔忽略了自己是退位国王,还试图将王权同时用于政务和家务,就注定难以平衡好“国”与“家”的关系。

对高纳里尔和里根而言,百名骑士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高纳里尔就骑士问题曾与李尔沟通:“他们成天吃、喝、玩女人,简直把这儿当作了酒馆、妓院,哪里还是一座庄严的御邸?这一种可耻的现象,必须立刻设法纠正;所以请您依了我的要求,酌量减少您的扈从的人数……”(莎士比亚,2019:22)尽管李尔为骑士们辩白,但从文本中李尔对高纳里尔的臣仆肆意谩骂,纵容老臣肯特打骂总管,不难看出高纳里尔所说并非空穴来风。考虑到王权继承者和一家之主的双重伦理身份,高纳里尔想要整顿家纪和国法,与李尔王沟通减少骑士随从的数量也可谓合情合理。

学界很多评论将大女儿和二女儿认定为全恶的反面典型,却忽略了她们所处的伦理环境。她们目睹了李尔王对考狄利娅翻脸的残酷无情与喜怒无常,因此时刻提防李尔会夺权害命。高纳里尔最根本的顾虑在于:“一百个武士!让他随身带着一百个全副武装的卫士,真是万全之计;只要他做了一个梦,听了一句谣言,转了一个念头,或者心里有什么不高兴,不舒服,就可以用他们的力量危害我们的生命。”(莎士比亚,2019:36)里根也想裁撤百名骑士:“让他们成群结党,也是一件危险的事。一间屋子里养了这许多人,拥戴着两个主人,怎么不会发生争闹?”(莎士比亚,2019:62)作为王权继承者,她们懂得审时度势,为了获取应有的权益,她们善于圆滑处事,委曲求全,也有杀伐的狠辣。但姐妹二人存在利己、谄媚、奸诈、多疑,甚至恶毒的性格。这些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李尔家庭的礼法崩溃,为后续父女之间、姐妹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最终,李尔王流落荒原,在暴风雨中经受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对人性和社会大彻大悟,但为时晚矣。一开始他心怀复仇的愤怒情绪,后来逐渐看清了血缘亲情的内在本性,恢复了人伦秩序中的父亲形象。杜勃罗留波夫说:“开头我们会对这毫无节制的专制暴君觉得痛恨。可是,跟着戏剧的发展,我们却越来越会把他当做一个人而加以谅解……”(杨周翰,1974:497)李尔能打动人心,很大程度上在于李尔在混乱的伦理身份中,在真假、善恶、好坏、美丑不断转换的伦理选择中,最终有了更清晰的伦理认知,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更深刻的伦理启示,被赋予了更丰富的艺术魅力。

2 考狄利娅不恰当的伦理选择

考狄利娅被认为是莎士比亚笔下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学者认为“考狄利娅可以说是悲剧主人公最完美的正面代表……她的人格和尊严散发着耀眼的光芒”(程美,2009:187)。文学伦理学批评则认为:“伦理选择一方面指的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指的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因此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聂珍钊,2014:267)考狄利娅至少在两次重要节点作出了不恰当的伦理选择,对于国破家亡的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1 执拗任性但真诚,三拒父王请求

分封国土时,李尔问考狄利娅“你有些什么话,可以换到一份比你的两个姊妹更富庶的土地”

(莎士比亚,2019:5),足见其对考狄利娅的偏爱。考狄利娅回答“没有”(莎士比亚,2019:5),干脆利落到令人感到尴尬、敷衍和冷漠。但李尔给了她第一次机会:“重新说吧。”她说:“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莎士比亚,2019:5)这样耿直的回答自然令听惯了阿谀奉承的李尔王心有不悦,但给了她第二次机会:“把你的话修正修正,否则你要毁坏你自己的命运了。”(莎士比亚,2019:5)考狄利娅简单解释了她刚才的话,转而言说姐姐们嫁人与爱父亲的矛盾:“我的姊妹们要是用她们整个的心来爱您,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嫁人呢?要是我有一天出嫁了,那接受我的忠诚的誓约的丈夫,将要得到我的一半的爱、我的一半的关心和责任;假如我只爱我的父亲,我一定不会像我的姊妹们一样再去嫁人的。”(莎士比亚,2019:6)或许考狄利娅是想表达为了爱父亲宁可不要嫁人,但表达出来的感觉是嫁人之后不再像从前那样爱父亲,因为丈夫需要她的爱。李尔却不能理解这个说法,也不愿去弄清女人结婚前后爱与情的差别:“年纪这样小,却这样没有良心吗?”(莎士比亚,2019:6)这也是李尔给她的第三次机会。考狄利娅回答“我年纪虽小,我的心却是忠实的”(莎士比亚,2019:6)。这在李尔王听来更像是针锋相对的回怼。最终李尔王勃然大怒,断绝了父女关系,剥夺了考狄利娅的继承权,将她远嫁法兰西,且不给她任何嫁妆。

首先,考狄利娅做出的伦理选择是“默默地爱着”(莎士比亚,2019:4),并坚持耿直的应答模式,多少有些恃宠而骄、执拗任性的意味。尽管她真心实意爱父亲,但她的语言表达与对父王深沉、真挚的敬爱不相匹配。当着若干大臣和外宾的面,她忽略了李尔王父亲与国王的双重伦理身份,没有顾全一个父亲的颜面和一国之君的尊严,最终让李尔王下不了台,让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尤其论及姐姐们嫁人,无异于当场揭露两位姐姐言辞虚伪,凸显自己的忠实与高洁,不仅与两位姐姐树敌,同时还挑战李尔王的耐心和王权至上的伦理观念。此外,考狄利娅的伦理价值观还过于稚嫩,将亲情和爱情对立起来,认为一旦嫁人就势必会让亲情疏离。当然,这符合人物所在的年龄与认知。

其次,身为王位继承者的伦理身份,考狄利娅的伦理选择没有表现出未来国君应有的行为风范。诚实、善良、率直的美德乃至做人的原则固然重要,但她在政治分权中没有顾全大局,过于与世无争,或者说没有国家意识,缺乏对国民的责任感。考狄利娅曾对两个姐姐说:“我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人,因为碍着姊妹的情分,我不愿直言指斥你们的错处……慢慢儿总有一天,深藏的奸诈会显出它的原形;罪恶虽然可以掩饰一时,免不了最后的出乖露丑。”(莎士比亚,2019:12)可见她深知两个姐姐品性不端、动机不纯,但她宁愿让父亲可能年迈不得善待,将应得的国土拱手让人,将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也不做灵活的变通,这些绝不应是一位政治继承者应有的谋略与行为。

另一方面,考狄利娅坚持不谄媚的伦理选择,在个人与家庭、臣子与君王、女儿与父亲、真与假的伦理道德冲突中,她没有在国土、财富和权威面前迷失自己的人格,彰显了独立的自我与个性,是对传统王权与父权伦理观念的双重漠视与挑战。这符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重视个人尊严、张扬个性的思想,冲击了传统的伦理秩序的社会现实。考狄利娅也因此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欣赏和爱慕,成为法国王后,与之建构了忠于人品、忠于爱情的夫妻伦理秩序,为后续考狄利娅率法军救父作了铺垫。

2.2 率法军赴英国作战讨伐恶人,却犯侵略之罪

考狄利娅了解到父亲流落荒原境遇凄惨,便与法兰西国王举兵进入英格兰。老臣肯特讲述了这场战争的起源:“凡是这两个公爵的明争暗斗,他们两人对于善良的老王的冷酷待遇,以及其他更秘密的一切动静,全都传到了法王的耳中;现在已经有一支军队从法国开到我们这分裂的王国,知

道我们疏忽无备,在我们几处最好的港口秘密登陆,不久就要揭出公开的旗帜……”(莎士比亚,2019:68)由此可推断考狄利娅出兵母国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法国利用考狄利娅爱父心切,打着解救李尔王的幌子出兵,企图趁英国内乱和疏于防范行入侵他国之实;第二,考狄利娅为父亲的遭遇愤愤不平,以女之名,要讨伐或惩戒两位姐姐。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考狄利娅出兵母国的伦理选择并不合适。

以女之名解救父亲看似正义,但此时考狄利娅的伦理身份不只是李尔王的三女儿,还是法兰西王后。于家庭而言,她试图借用外部势力解决家庭内部矛盾,重构家庭伦理的正常秩序,这注定会将矛盾扩大。内政的不义和姐姐们的不孝只有通过内部的正义解决才是正道;于国家而言,她动用法国军队攻打母国,视为背叛祖国也不为过。站在英国政治共同体的立场,即使两位姐姐贪婪为恶,治国不力,导致国家内乱,也是国家内部事务。但法军进入就可能包藏难以言说的政治目的,本质上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如善良正直的奥本尼(高纳里尔的丈夫)指出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王上和他手下的一群人在法国的煽动之下,用堂堂正正的理由向我们兴师问罪,而是法国举兵侵犯我们的领土,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莎士比亚,2019:127)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考狄利娅发动战争,让两国士兵流血牺牲,让母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实在算不得善举和正义之举。

莎士比亚安排考狄利娅发动英法战争,也映射着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的历史。身为英国人的莎士比亚怎么能让法军赢得侵略英国的非正义战争呢?考狄利娅最终以悲剧收尾:法国军队最终被英国军队打败,考狄利娅被奸人埃德蒙下令缢死狱中,李尔王抱着考狄利娅在悲愤之中死去,这也蕴含着莎士比亚的伦理思想。

肖谊指出:“莎士比亚的故事大都是对古老欧洲传奇故事的重写,在成为经典后,后来的作者又对其进行重写。”(肖谊等,2021:125)《李尔王》就是如此。其悲剧结尾让世世代代的读者为考狄利娅扼腕叹息,尤其是在18世纪倾向于将“理性”和“道德”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尺度的时代,英国文学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曾批判《李尔王》的悲剧结尾“有悖天理”。据研究,“1681年,内厄姆·泰特(Nahum Tate)将《李尔王》改写为《李尔王传》(*The History of King Lear*),他删去了弄人这一人物,让考狄利娅爱上了爱德伽。最后李尔归位,国土统一,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红薇,2021:148)。这样的改写在英国舞台上也仅仅存在了一百多年,之后莎士比亚的悲剧结尾依然作为经典流传在世。莎士比亚用悲剧的艺术,将真的、善的、美的撕毁了给人看,揭示了不合时宜的伦理选择最终都会承受相应的不良后果,以更震撼人心的效果达到了道德教诲和净化心灵的作用。

3 高纳里尔和里根触犯双重伦理禁忌

从高纳里尔和里根所处的伦理环境考虑,她们并非完全一无是处。首先,她们冲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能敏锐抓住机会,大胆地追求政治和经济地位,实现自己的价值;其次,她们勇于追求自己认定的爱情,其实是没有看清这是违背婚姻的出轨行为,因此她们具备一些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肯定人有追求世俗欲念的权利。但她们也因为世俗欲望膨胀,最终罔顾人伦,一步步陷入道德沦丧的泥潭,主要表现为她们触犯了双重伦理禁忌。

3.1 为王权,姊妹联合弃父,企图弑父

“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形成与变化,从制度上说都是以禁忌为前提的。禁忌是人类力图控制

自由本能即原始欲望而形成的伦理规范。”(聂珍钊,2010:12-22)时至今日,文学作品中的伦理禁忌问题仍然能触动人类的灵魂,《李尔王》中最令人震惊的伦理悲剧之一是高纳里尔和里根触犯了弃父甚至企图弑父的伦理禁忌。

姐妹二人对王权有着狂热的欲望。她们在榨干父亲的权力价值之后,便心照不宣地联合胁迫李尔王裁撤随从,以剪除李尔王对她们权力的威胁,并不约而同地谋划遗弃父亲。“人类由于理性而导致伦理意识的产生,这种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乱伦禁忌的遵守,对建立在禁忌基础之上的伦理之上的理解与接受。”(聂珍钊,2012:10)然而姐妹二人并没有建立这种伦理意识。在葛罗斯特大臣的城堡的那一场,父女三人对峙的局面堪比大型讨价还价现场。先是里根建议李尔王接受高纳里尔裁撤50位骑士的要求。当李尔王妥协,表示愿意从此依靠里根时,里根断然加码,要求裁撤到25个骑士。而当李尔王无奈之下表示愿意带50个骑士跟高纳里尔生活时,高纳里尔出尔反尔说带15个骑士都嫌多余。里根则步步紧逼表示一个随从都不能带。这场伦理冲突看似是父女就裁撤百名骑士的数量之争,实则是两个新君主联手褫夺前国君的尊严之战,也是两个女儿沆瀣一气推诿赡养父亲的责任与义务,意图弃父之举。正如弄人所言:“老父满囊金,儿女尽孝心;命运如娼妓,贫贱遭遗弃。”(莎士比亚,2019:56)

姐妹二人不加遮掩地意图弃父,随后弑父、弑君的企图逐渐昭然若揭。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对混沌理论有清晰的定义:“乱伦正是从混沌中产生,其中包括血亲相奸和血亲相残两种,血亲相残指的是弑母、弑父、弑君三种。”(汤霁昀,2011:38)高纳里尔曾说:“与其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害怕人家的暗算,宁可爽爽快快地除去一切可能的威胁。”(莎士比亚,2019:36)这句话暴露出高纳里尔意图触犯杀父、弑君的伦理禁忌。正如娄林分析,“李尔王从君王到普通的父亲,这样的让渡远远不够,她们的权力逻辑不能容忍李尔肉身的存在,因为这个身体会让人想到他的尊严,他的王权……如果我们仅仅将两姐妹看作绝对的道德之恶,就会忽略她们背后的权力逻辑,这或许是莎士比亚需要我们认清的政治现实的权力逻辑”(娄林,2021:128)。她们装模作样表示只愿意收留李尔王一个人,实则是逼迫李尔王在狂风暴雨的恶劣天气流落荒原。高纳里尔还警告老臣葛罗斯特千万不要收留李尔王。里根则只关心自己的王权和安危:“关上您的门;他有一班亡命之徒跟随在身边,他自己又是这样容易受人愚弄,谁也不知道他们会煽动他干出些什么事来。我们还是小心点儿好。”(莎士比亚,2019:65)她们任年老的父亲自生自灭,丝毫不在乎其死活的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聂珍钊指出:“即便社会发展到现在,人的理性也不能完全控制兽性,人仍然是现代社会中由理性和兽性结合而成的斯芬克斯怪兽。”(聂珍钊,2010:12-22)高纳里尔和里根对权力的贪婪和对毫无利用价值的老父亲的虐待,纠集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人性中的兽性因子占了上风,她们完全丧失理性,于是展开反人性、反社会的弃父、弑父和弑君行为,自此人伦屈从于权力,权力颠覆了家庭伦理的正常秩序,李尔与两个女儿彻底决裂。

3.2 为情欲,姐妹相残,命归西天

高纳里尔与里根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新兴女性贵族对男权天下的叛逆和对命运的抗争。但她们没有认清埃德蒙带来的是虚妄的爱情,还真挚而热烈地将这份爱当作最重要的部分,不惜同胞相残,高纳里尔甚至为此企图谋杀亲夫,不惜忽略对亲人、家庭乃至国家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其实,莎士比亚不是在纵容并支持这种恋爱,而是展示给观众,让观众评判。

埃德蒙为了改变庶子的命运,得到更大的权势,同时对两位新君主假意殷勤,左右斡旋。高纳

里尔与其臭味相投,深陷情欲之中忘乎所以,她在写给埃德蒙的信中说:“我将要成为囚人,他(指丈夫奥本尼)的床就是我的牢狱。把我从这可憎的温热中拯救出来吧,他的地位你可以取而代之。你的恋慕的奴婢(但愿我能换上妻子两个字)。”(莎士比亚,2019:119)足见高纳里尔厌恶忠厚正直的奥本尼,为了能与埃德蒙顺理成章地结合图谋杀亲夫。康华尔已死,单身寡居的里根也被埃德蒙欺骗和利用,她与埃德蒙结合更有伦理上的优势,曾当众宣布:“请你接受我的军队、俘虏和财产;这一切连我自己都由你支配;我是你的献城降服的臣仆;让全世界为我证明,我现在把你立为我的丈夫和君主。”(莎士比亚,2019:133)

《李尔王》创作于斯图亚特王朝末期,英国社会主要奉行的依然是中世纪的婚姻伦理,即维护一夫一妻制的罗马传统。奥本尼知道三人之间的奸情后,指控他们:“埃德蒙,你犯有叛逆重罪,我逮捕你;同时我还要逮捕这一条金鳞的毒蛇(指高纳里尔)。贤妹,为了我的妻子的缘故,我必须要求您放弃您的权利;她已经跟这位勋爵有约在先,所以我,她的丈夫,不得不对你们的婚姻表示异议……”(莎士比亚,2019:134)由此可以判断,第一,已婚女子,即使女性君王有婚外恋情,在当时也是不被接受的;第二,为婚外情人谋杀丈夫是重罪;第三,姐妹与同一个男子有婚约是不伦的婚恋。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无意识主要是由两种基本本能构成:自我本能(生存本能)和性本能。但是人的本能又受到文明的压抑。其中,被压抑得最彻底的是针对亲人的性和暴力,也就是乱伦和弑亲。后来就产生了两大伦理禁忌:禁止族内通婚和禁止同胞相残(聂珍钊,2007:10)。高纳里尔为了争夺姐妹俩共同的情人,将血亲之情和夫妻情分抛诸脑后,犯下同胞相残、弑杀亲夫的伦理禁忌,并选择自尽而亡。埃德蒙临死还对这种不伦之爱得意地表示:“我跟她们两人都有婚姻之约,现在我们三个人可以在一块儿做夫妻了。”(莎士比亚,2019:139)三人任由兽性因子肆意发展,心安理得地将自己的欲望建立在血亲的尸体之上,不伦的情欲诱惑、权力倾轧对血缘亲情和公序良俗的破坏力量达到了无法重构的程度。

聂珍钊说:“文学伦理学中当伦理混乱无法归于秩序或者不能秩序重构时,则形成悲剧文本。”(聂珍钊,2005:8-11)莎士比亚正是用无法重构的伦理混乱作为高纳里尔和里根的悲剧结尾,揭露了毫无人性的个体欲望对骨肉血亲和伦理之爱的损伤与毁灭。

4 结语

《李尔王》清晰地展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丧失的混乱伦理。李尔家族一家、两代、四口,最终落得国破、家毁、人亡的结局,本质上是一场伦理悲剧。李尔身陷父与王的双重伦理身份混乱之中,选择将王权同时用于政务和家务,最终与三个女儿产生伦理冲突,导致国不稳家不宁;考狄利娅的两次伦理选择先导致她失去继承权,后来竟然出兵母国,发动非正义战争,直接导致兵败中她被俘并死于狱中;高纳里尔和里根为了巩固王权残忍弃父、图谋弑父,又被爱德蒙利用,为情欲不惜同胞相残、意欲谋杀亲夫,触犯双重伦理禁忌。《李尔王》呈现了一个伦理失范后的悲惨世界。如此多的伦理之失应给读者带来更多伦理之思。聂珍钊认为:“莎士比亚正是把伦理道德方面的冲突同政治斗争与哲学思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才增加了悲剧的深度。”(聂珍钊,2005:10)《李尔王》展示给读者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还映射到那个时代整个英国的时局,因此承载了更具广度和深度的道德教训和伦理教诲价值。莎士比亚还利用这部戏阐释了他的国家意识,即领土完整是国家的基本象征,国王是国家的王,国不能当成家庭一样可以分家。这种国家意

识对当今国家治理依然可借鉴。另外,时至今日,这部戏对提升个人修养、构建家庭伦理关系、如何赡养老人、何为爱情婚姻,提高口才艺术、学会识人用人,乃至弘扬优良家风、提升行政管理能力等方面仍具有伦理教诲和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 Bradley, A. C. 1992. *Shakespearean Tragedy*. 3rd ed[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Jan Kott. 1966. *Shakespeare, Our Contemporary*[M]. Boleslaw Taborski (trans.),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 陈红薇. 2021. 改写[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程美. 2009. 宗教视野下《李尔王》的悲剧色彩[J]. 安徽文学(下半月)(3): 186-187.
- 弗洛姆. 1988. 为自己的人[M]. 孙依依,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葛靖. 2022. 从君主论理论解读“李尔王”悲剧的必然性[J]. 四川戏剧(7): 77-79.
- 华泉坤, 洪增流, 田朝绪. 2007. 莎士比亚新论: 新世纪, 新莎士比亚[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娄林. 2021. “李尔的影子”——略论李尔王的身份与自我探知[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 123-135.
- 李伟民. 2008. 道德伦理层面的异化: 在人与非人之间——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伦理学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1): 101-107.
- 李伟民. 2008. 中西伦理中的“孝”——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伦理观念[J]. 英语研究(3): 22-25.
- 聂珍钊. 2005. 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 外国文学研究(1): 8-11.
- 聂珍钊. 2007. 在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所做的题为《伦理禁忌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讲座.
- 聂珍钊. 2010. 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1): 12-22.
- 聂珍钊. 2012.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汤霖昀. 2011. 伦理悲剧——《李尔王》新释[J]. 语文学刊(12): 38-39.
- 威廉·莎士比亚. 2019. 李尔王[M]. 朱生豪,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吴笛. 2022. “斯芬克斯因子”溯源与阐释[J]. 外国文学研究(6): 26-36.
- 肖谊, 谢梦昕. 2021. 元认知与英美小说对莎士比亚的挪用[J]. 外语与外语教学(2): 123-129+151.
- 杨周翰 编选. 1979.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G].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Ethics in Shakespeare's *King Lear*

LI Zhengshuan YE Hongting

Abstract: *King Lear* is an ethic tragedy. The wrong ethical choices of the four people in Lear's family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tat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amily and heavy deaths of people. This results from the royal family of Lear whose ethics had gone astray. Either as a father or as a king, Lear fails to perform these ethic identities and his improper ethical choice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whole tragedy. The ethical choices of the eldest daughter and second daughter in the deformed love betray their conscience as daughters, destro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destroy the political disciplines in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The youngest daughter is both pitiable and detestable in that as a female she chooses to love her husband and father, and as a daughter she chooses to take revenge for her father. However, she neglects the state's ethical identity and leads the French forces to fight the English army in England, thus committing the crime of invading England. By writing this tragedy, Shakespeare calls for deep thought and has been enlightening posterity everlastingly.

Key words: *King Lear*;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hoice

责任编辑: 肖谊